

# 回忆陆埏

罗辽复<sup>†</sup>

(内蒙古大学 呼和浩特 010021)

2015-04-10收到

<sup>†</sup> email: lolfcml@mail.imu.edu.cn

DOI: 10.7693/wl20150507

1952年我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填报的志愿依次是北京大学(简称北大)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数学系,复旦大学数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可能因为成绩较好,被录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二部,预备留苏。10月初的一天,我只身登上从上海到北京的列车,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连坐了30多个小时,终于快到北京了。这时,发现座位后的那位青年和我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于是我认识了陆埏,我们拿出发榜的《解放日报》相互证实身份,巧的是报考志愿竟然完全相同。翌年我俩都未能出国,由教育部直接按第一志愿送北大物理系学习,开始了我们的物理学“追梦之旅”。20世纪20年代科学界流传着一句话:“背着书包到Gottingen去,因为那里才能学到真正的物理学”;50年代的中国,对物理学怀着好奇和兴趣的年轻人似乎心里也响着一个声音:“背着书包到北大去”。我们一点也不后悔

未能出国,因为留在北大可以学习物理。

美好的燕园生活给年轻的追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们背着书包从食堂向图书馆飞奔疾驰的日日夜夜,记得在未名湖畔,中关村小树林里和同学的谈心交流,谈兴最浓的是陆埏。当学到相对论和量子论时,物理学的两次革命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每个人的心。陆埏知道的科学史故事多,这方面占据很多的谈话内容。大家也交流学习方法,他对我每堂课后拿着笔记逐条思索几十分钟的经验颇感兴趣。回忆北大几年受到的教育,除了物理学基础知识外,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是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从进校门的第一堂课起,老师就教导我们在科学上“不能胡来”,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思考及处理问题的方法;第二是创新精神,开拓精神。从物理学中我们逐渐学会如何抓住基本事实考虑问题、探索新路子的方法。回忆求学岁月,我们一道欣赏老师们对物理概念的剖析,共同感悟黄昆老师“我只会做简单的事,因为我头脑简单”的治学名言。有一次我俩去看望虞福春老师,虞先生讲了他的老师Bloch的一个故事,Bloch是Heisenberg的学生,Heisenberg问Bloch宇宙是怎么回事?Bloch解释了许多后,Heisenberg说:“废话,天空是蓝色的,有鸟在自由飞翔。”这些风趣睿智的对话,令我们一生难以忘怀。

我和陆埏于1958、1959年先后

离开北京,分赴内蒙古和东北工作。从1960年开始,我俩借助通信,合作科研。到1981年7月,两地往返信件达2800封。如果算上和杨国琛的三人通信,以及后来更多同学间的通信,总数还要更多。为了便于索引,我们从1962年开始对学术通信进行编号,陆埏给我们的编号为LTXXX,我给他们的编号为LFXXX。据1981年7月的记录,单是我发出的标号信件有1516封,陆埏发出的为1290封,其中很多都是复写3份,向两地发送的。在1960—1970年代里,邮递是远程联系唯一的方式。因恐邮途耽搁,也为了赶时间,我们经常徒步半小时,亲手把信件送到邮局。这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基本粒子理论问题,后期(1976年后)也涉及高能天体物理的一些问题。作为北大1953年级的学生,良好的基础课教育,增强了我们对科学的执着感情。但那时的研究生教育还刚刚起步,同年级一百多位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个研究生。所以大学毕业后,只能靠自己独立的摸索,去探寻科学研究的道路及学科的前沿动向。“十年动乱”所造成的闭塞更增添了科研路上的艰难。在和陆埏、杨国琛等同学一起“远程”工作的日子里,作为科学队伍中的“游击小分队”,我们左冲右突,想方设法,坚守着大家最初的梦想。

除了通信联络,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见面探讨科学问题。有时我回家探视父母时弯道南京、天津逗



图1 陆埏(左)与罗辽复(右)在南京玄武湖畔留影(摄于1975年)

留几天，他们也几次专程来内蒙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70—1975年陆埏从军工单位转业到南京一家电子仪器厂工作期间，我先后几次到马台街他家中拜访。那是一间极为简陋的平房，只见陆夫人提着水桶从外面水管打水回来，而他则头戴棉帽，身穿棉袄，腰间围着电热器（因患腰疾需理疗），正在认真查阅厚厚的文献……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我和陆埏、杨国琛在粒子物理学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试探性探索，涉及到的问题主要包括：研究了中微子质量非零的可能性及宇宙中中微子成团，轻子物理和弱作用的对称性，由夸克模型导出奇异粒子非轻子衰变的选择定则，由夸克相互作用得到强子的一系列质量关系，研究 $J/\psi$ 粒子和其他新粒子的唯象学方面，建立一种左右对称的弱电统一理论，提出轻子和夸克的内部对称性和结构模型，研究了磁单极子对束缚态的高自旋特性及其多光子衰变，研究反常中子星和中微子回旋辐射，提出高密物质夸克集团相的概念并研究中子星磁场起源等。此外，还在理论物理学其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以上课题共计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约40篇。改革开放之前，论文只能在国内发表。1980年，我们合作的关于弱电统一和破缺对称性的论文，经过了若干关卡，终于在 $Physics\ Letter$ 上发表了，这属于那个年代国内学者首批将论文发表到国际刊物的先行者之一。

与陆埏通信合作科研的经历是我珍藏一生的美好记忆，从以下两个例子便可窥见一斑。一是1966年我参加北京原子能所组织的层子模型讨论会后，把这个动态告诉了陆

埏和杨国琛。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们都被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所吸引。据夸克模型，重子和介子的质量应是相关的。陆埏提出了用图来表示夸克作用的方法，我们三人随即通过计算得到了一些重子和介子的质量关系。1968年由陆埏执笔把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手稿第一页书眉处还工整地写着“最高指示”。但论文无处投递，在手头积压了六七年，直到1975年《物理学报》复刊才幸运地得以发表。另一个是和陆埏合作研究 $J/\psi$ 粒子。1974年12月，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肇中的这个发现后就十分注意。LF588写道：“ $\psi$ -3 Gev 粒子之发现说明3 Gev 能区中可能出现了新型作用，当然也可能还是强作用主宰，不过由于 $\psi$ 粒子的一系列量子数而禁戒了它的很快衰变”。LT576作了答复，写了一个初稿，明确指出狭窄的共振峰说明了新组分的存在。经过一番频繁而紧张的讨论，LF593写了最终定稿，题为《高能正负电子对的湮没与可能存在的一种新型作用》。据LF594对当时情况的记载，“此文于1974年12月18日下午送出，半个月来，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斗争之场”。此稿很快收到《物理学报》主编朱洪元先生的回信（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2月19日），他是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理论的领头人，信中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指出新粒子详细实验资料已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因为除了《参考消息》的简单介绍外，我们还没有读到正式发表的论文），并介绍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对此问题的看法和研究动态。信是写给内蒙古大学基本粒子组的，我在LF595中摘抄了朱先生的信，并在后面写了两句话，“接读朱先生的信后松了一口气，LF593的方案和实验事实没有矛盾！”这个例子多少反映了“文革”正酣时，我们通信合作搞科研的紧张忙碌并有些尴尬的情况。当时学报编辑部的稿件积压现象非常严重，但这篇稿子迅速在1975年2月的《物理学报》上发表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论文已尘封于历史，渐行渐远。值得回忆的是，陆埏身上所体现出的严谨治学的品格，在解决疑难问题时非常注意物理图像的建立和运用的特质。这段特殊的科研时光已经化成我日益消退的记忆中永久的珍藏。

1978年，由于在基本粒子理论方面的一点成果，我和陆埏都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得了大会奖励。作家柯岩对我们通信搞科研的经历感兴趣，采访后撰写了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发表在1978年4月出版的《人民文学》上，后来又被收录在书名为《奇异的书简》柯岩报告文学集中。

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陆埏非常重视实验，并善于在实验中运用理论。在电子仪器厂技术情报室工作期间，他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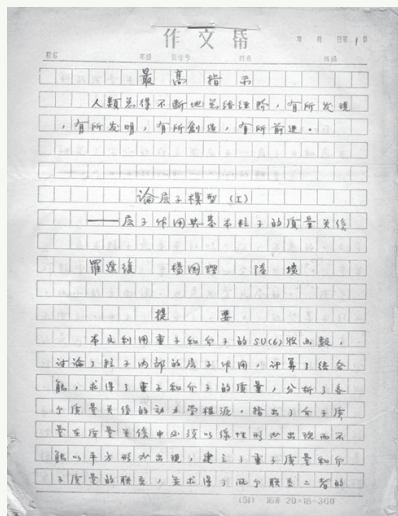


图2 1968年由陆埏执笔的三人研究论文手稿





图3 陆埏(右)、罗辽复(中)、杨国琛(左)在学术讨论中(摄于1979年)

物《电子技术与数字化》，从1970年到1974年共出了7期，刊登了多篇有理论深度的介绍技术发展的好文章。陆埏十分关注物理学中各方面的实验新成果，我和杨国琛都在通信中受益其指点。例如，当时我们正在热议基本粒子问题，LT272中他却向我们介绍了Josephson效应，并于后来发起了“势阱结超导电流”的理论工作。LT410中他写道：“我们的眼睛应始终望着实验，望着实验数据，望着实验条件，望着实验可能”。并引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话：“用了太多的理论大家就会怀疑”，“一个最好的理论是几乎不用任何理论的理论”。

1973年前后的某一天，我和陆埏泛舟昆明湖上，总结了几年合作科研的经验后，体会到科研选题的重要性，便尝试提出各方面的课题，多中择优。接着我俩便在通信中展开了“选题战”。把想到的课题以提出时间为序进行编号，一年内大约想到了一百多个题目。随着“选题战”的深入，我们总结出了优秀课题的几条标准：

1. 理论前提可靠(包括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数据)；
2. 具有基本意义；

3. 估计会有本质上新物理结果；

4. 与近期(在可预见到的将来)实验联系起来；

5. 适合于我们的工作条件，并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特长和有利条件。

尽管这些标准主要是总结前一段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但对于我俩确定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也产生

了重要影响。

1978年柯岩的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在听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而于热闹中我们已在反思，因为那时做粒子理论的困难已经显示出来。由于高能实验的周期愈来愈长，实验资料的积累愈来愈困难，理论的推测成分也就愈来愈多。8月的庐山全国物理学会议期间，我们三个人有机会相聚面谈。大家注意到了Dyson在*Physics Today* (1970)一篇题为《物理学的未来》的文章。文中回忆，1938年，Rutherford去世一年后，Bragg接替卡文迪士实验室主任之职。这时高能物理的领先地位已转移到伯克利，使人们大为吃惊的是Bragg无意于重建领地。他坐在卡文迪士的办公室里颇为自得地说：“我们已成功地教会了全世界如何搞核物理，现在我们来教他们干些别的事情吧。”Bragg乐于支持的是一伙怪人，他们做的那些东西在搞高能的人看来很难叫做物理学的。有个叫Ryle的，刚打完仗从军队里复员，带回一车乱七八糟的无线电零件，他想用这堆破烂在太空中寻找射电源；另一个是Perutz，他已花费了10年时间用X射线分析血

红蛋白分子结构，并颇为轻快地说，再有15年他就要搞出来了；还有个疯子叫Crick，他似乎对物理学一概丧失了兴趣。于是Dyson说：“我像大多数搞理论的朋友们一样，感到在这里跟着这帮小丑是什么也学不到的。我决定到美国去，找个真正搞物理学的地方。”但是7年后，Bragg从卡文迪士实验室退休，这时候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Bragg说他要教世界干些别的事情，并不是在吹牛皮说大话，他给卡文迪士实验室留下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研究中心，在两个领域内居于世界最前列，这就是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Bragg受命于危难中，是如何把事情搞得那么好的呢？“我以为他之所以能搞好是遵循了以下三条：1. 不试图恢复过去的荣誉；2. 不赶时髦；3. 不怕理论家的轻蔑”。Dyson的这篇文章引发我们内心极大的震撼，这是不满足已有成绩的创新的冲动，是追求卓越的求实的呼喊。实际上一年前，我在1977黄山基本粒子学术讨论会上就听杨振宁说过“Party is over”，意思是说，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宴会”已经结束。会后我曾把这个看法转达给了陆埏和杨国琛。于是在1978年的庐山会议后，我们下了决心，准备改行。

到了1980年代，我们的研究方向分别完成了大转弯。陆埏成功地转到了天体物理，我则转向了理论生物学。其实，在眼花缭乱的生命复杂性和生化名词中我经常找不到北，只是对其上游的基本规律性很有兴趣。我相信这些基本规律是物理学的一部分而不会是非物理的，并且相信它们一定可以用数学的形式定量地表达出来。我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新问题，于是想通过理论物理学

和生物学的远缘杂交获得一些新的发现，留下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的成果。我们虽然转到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但科研动机是一致的。

1998年7月张衡天体物理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作为东道主，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陆埏统计了与会人员的年龄分布，提出了我国科学家年龄结构的“两峰夹一谷”现象，第二峰可以称为“邓峰”，因为和邓小平复出有关。于是我即兴写了四句话：

学习邓小平，再干二十年，创造七十载，扎根中华园。

我说，青中老结合，适合中国国情，也提供了更多的创造机会。众所周知，Bardeen、Cooper和Schrieffer老中青相结合，奏响了一曲超导之歌，获得了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这期间，陆埏所领导的高能天体物理小组已经做出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在伽玛暴和致密星等方面发表了一批国际上先驱性的研究成果，获得广泛引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领导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一支年青的天体物理学队伍已经成长起来。

陆埏是如何把事情做到又做好的呢？在《谈谈研究生的培养》一文中，他写道：“我非常欣赏玻尔培养学生的作风。大家知道，玻尔曾经培养了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许多大物理学家也多以成为玻尔的学生而自豪。据说，有一次玻尔访问苏联，在他做完学术报告后，有人问，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跟随他学？他回答说，因为他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傻瓜。当时翻译竟将这句话译成“不怕说年轻人是傻瓜”，引起哄堂大笑。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卡皮查(P. L. Kapitza, 1978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场站起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一字之差，其实反映了两个学派(玻尔学派和朗道学派)根本思想的不同。这个传闻很能说明玻尔与学生之间的极好关系。”这段话同样印证说明了陆埏在年青学者中具有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的原因。

2002年5月南京天体物理学讨论会中，在祝贺陆埏70寿辰宴会上，何泽慧先生动情地说：“我最佩服的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陆埏。”回应何先生之言，我在5月25日讨论会闭幕式上做了题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发言，分析了陆埏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经验。“我认为这个小组在科学研究中的成功，第一是因为方向和课题选得好，看得准；第二是因为在理论方法上紧扣住交叉科学的特点，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并且充分利用网络，反应迅速；第三是导师和学生频繁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点燃了青年人的创造之火焰。陆埏小组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老中青相结合；第二，‘打出去’（打出国门）和扎根本土（研究生毕业后都在国内工作）相结合。我认为这是两条重要经验。”关于老中青结合，我说：“你常常惊奇地看到，年轻人是如何快速地成长，并且发现他们能做成年人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这是H. Bethe 1961年为Schweber的《相对性量子场论引论》所作序言中的第一句话。而当Bethe在六年前写那本著名的《介子和场》(1955)时，Schweber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当看到在座的一批青年天体物理学家时，我有类似的感受，因为二十年前，我曾在这个领域当过两年票友。”

我们知道，Chandrasekhar曾经为白矮星规定了一个质量限，但很

少有人知道，他还为科学家的年龄规定了一个限度。在比较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年龄特征后，Chandrasekhar写道：“1817年，贝多芬47岁，当一个较长的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的沉思时期快结束时，他对Potter说出了肺腑之言：现在，我知道如何创作了。但是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了40岁才说，我现在知道如何研究了……随着科学家的成长和成熟，他的无能也就愈明显。”在同一篇文章中Chandrasekhar还引用T. Huxley的话：科学家过了60岁害多益少。Rayleigh的儿子问父亲，您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Rayleigh答道：“如果这位年过60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的成就指手画脚，那很可能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那情况就可能不相同了。”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人逐渐接近目标时已垂垂老矣，如果他就在这里停了下来，也许若干年内不会有人再登到这个高度，并且沿着他的经验去把所开启的事情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仅需要青年，也需要老年。Chandrasekhar所设定的年龄限只对那些对青年指手画脚的人成立，而对在科学一线工作的人，自当别论。陆埏的一些重要科研成果都是在60岁后和年青人合作完成的，生动地说明了和青年人一道工作，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是最好的工作方式之一。

我在发言中还说：我们当然也可以超越Chandrasekhar限。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我愿作一新解：无求而大求，无为而大为，自我完善，自得其乐。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片面追求SCI论文数量，追求影响因子。在这种气





图4 陆埏(右一)、何泽慧(右二)、罗辽复(右三)、李惕培(右四)相聚在内蒙古(摄于1998年)

氛笼罩下，冷静地思索一下科学研究的动机是有益的。因发现W和Z粒子而获得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意大利科学家鲁比亚说，“我们从本质说，并非被成功所驱使，而是一种激情，也就是对更充分地认识真理，拥有更多真理的渴望”。爱因斯坦也说过，“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莱辛的名言中得到鼓舞，真理的追求比真理的占有更可贵”。艺术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欢快，没有欢快就没有艺术。对规律的认识也伴有欢快的情绪。一些科学史家认为，这种对欢快欲望的追求是推动科学理论前进的动力。美是真理的光辉，科学家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美学的冲动。

会后6月份我接到何泽慧先生的函件：“您上次在南京最后一天的报告我非常欣赏，这是我在那次会上最欣赏的一个报告。可惜我现在记忆力差，不知您有没有那天演讲的书面材料，让我可以细细看看，学习学习，欣赏欣赏。”（这篇发言

稿发表于《现代物理知识》2002年第6期）。

陆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中度过了不凡的一生。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这是他女儿对父亲的评价。陆埏在大量紧张的科研工作之余，还特别关注科普。他认为一本好的科普著作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决不亚于一部专著。在其约请下，我们合作写了《从电子到夸克》。陆埏的写作极度认真，书中每一个图表中的粒子数据，都要查最新的原始数据进行核

对。2014年初，他想利用这套丛书再版的机会做一次全面的修改，我俩详细讨论了修改计划。可以告慰陆埏的是：尽管由于他不幸过早去世，未能亲手执行这个计划，我已依据他的想法，完成了这项工作。陆埏写科普还有一个特点，愿意收集科学史的故事，《从电子到夸克》这本小书便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

对科学史，陆埏情有独钟。品读科学史，可以给人智慧，增强方向感和前进的动力。我们多次回顾和评估了物理学重大事件，对物理学家进行排队，找出最杰出的几位，最后都赞同*Physics Today*上遴选出的从哥白尼、伽利略到费曼、杨振宁等18人名单。2007年，在他的邀约下，我们合作了《宇称不守恒发现半个世纪的回顾》。2009年，深感于某些重要科学发现被湮没和历史记述的不公正，我们写了题为《科学作品的影响力和科学家的舛运》一文。列举了很多科学家

的蒙难故事，例如北大教授虞福春发现的化学位移和王竹溪、汤佩松两位先生提出的细胞水分的热力学理论，就属于这类湮没或半湮没之例。文中写道：“爱因斯坦是命舛一时，孟德尔是命舛一世，虞福春、王竹溪、汤佩松、赵忠尧等先师则是永远蒙难了。请不要因历史的不公正而苦恼，因为历史有太多随机因素。我们还是回归科学研究的动机吧，一是享受过程，二是获得结果，两者都是甜美的事。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享有一片自由的天空，如果既已在探索中度过愉快的一生，又获得了真实的经受住历史考验的成果，难道这还不够满足还需要别的什么吗？”这篇文章是和陆埏多次反复讨论后完成的，先在《科学》上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载(2010年第3期)。

2012年2月，我在祝贺陆埏院士八十华诞的学术会议上做了《生命与量子》的报告，并即兴赋诗一首：“幸会第七龙年，同感天赐安康；惊异闲暇自由，渔人大海夕阳”。后两句的‘惊异、闲暇、自由’是亚里斯多德所论人类科学发生的三条件，我强调了这3个条件在今天对于产出创造性科学成果的指导意义，而‘渔人、大海、夕阳’是演绎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故事，说出了我当时做蛋白质量子折叠理论的心情。

什么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的动力？我在一本希尔伯特传记中，找到20世纪初德国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宣誓仪式上的一段话：“我庄严地要你回答，宣誓是否能使你用真诚的良心承担如下的许诺，你将勇敢地去捍卫真正的科学，将其开拓，为之添彩，既不为厚禄所驱，也不为虚名所动，只求上帝真理的

神辉普照大地，发扬光大。”我把这段话抄给了陆埏。我们认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就是科学研究的内在的动力。正是由于这种优秀的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发扬，追求真理，蔚然成风，使得20世纪前三十年的欧洲成为了世界科学的中心。

在和陆埏交往的最后一年中，我们之间的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仍然很频繁。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商讨对《从电子到夸克》的修改补充；二是对我所研究的生物大分子量子理论的讨论；三是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寻找快乐。

当知道我在蛋白质量子理论方面的工作和收到的一些正面反应后，陆埏十分高兴，主动要把上面提到的那篇《生命与量子》的报告发给朋友分享，还帮助我联系，希望就在国内做直接的实验来证明蛋白质折叠是一个量子过程。尽管1960年代Pullman夫妇的量子生物化学在核酸分子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它只触及了大分子的电子运动，无法讨论在生物学更广范围起作用的大分子构象变化，因此后来量子理论实际已退出了生物学，这些年来，生物学界对量子观点的拒绝已成为较流行的趋势。我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的。“这个情况有时使我想起20世纪初期物理学界对原子理论的拒绝，以至于1906年伟大的玻尔兹曼也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毁灭了自己。这说明先进的观念被人们接受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甚至有时要经历多么痛苦的过程”。陆埏听了我的不无感慨的陈说后却乐观地说，“但他(玻尔兹曼)还是很快就胜利了”。由于陆埏对生物大分子量子理论的支持和推荐，使我的相关论文的发表至少提早了半年。

我们在几十年通信中经常吟颂喜爱的诗词相互鼓励，言语情节，没齿难忘。记得1964年，他送我一本郑板桥集，附言中抄写了诗句“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我则回以蒲松龄的名言，“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一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他借口李白戏问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我则答以“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并引贾岛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为学如探险，我曾在北大求学时的笔记本扉页上写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海象与木匠的对话诗句：“是时候啦，海象说可以谈谈许多事体，鞋子船舶和火漆还有白菜和皇帝。”

陆埏是一个生性幽默的人，他特别喜欢这几句话。2014年我们重温了这段诙谐的对话。有一次短信中他写了“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这几句话出自《儒林外史》，显露出他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心，于是我就沿用吴敬梓的曲调，改了几句，借以怀旧和安慰：“记得当年，我爱未名，远离故乡。恰同学少年，几番啸傲；中关村里，几度徜徉。……今已矣！把衣冠蝉蜕，看舞云端。……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信息生物，粒子天体，补入残编待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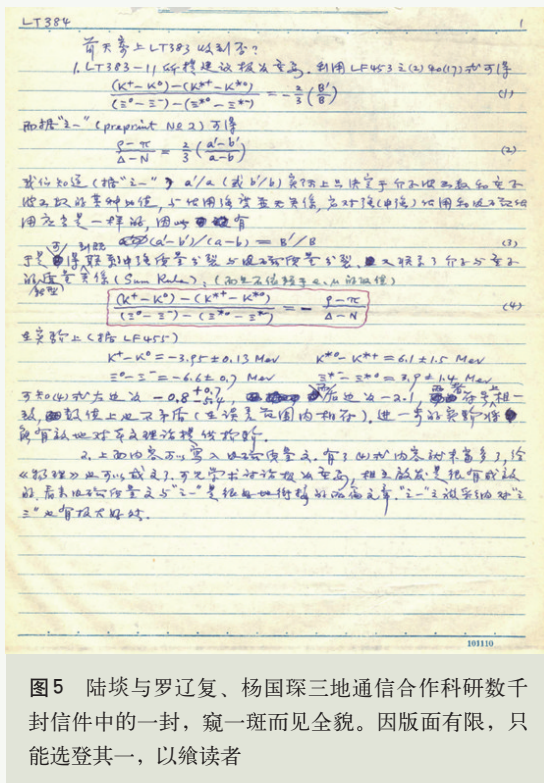


图5 陆埏与罗辽复、杨国琛三地通信合作科研数千封信件中的一封，窥一斑而见全貌。因版面有限，只能选登其一，以飨读者

感。从今后，持药炉经卷，拜礼吾王。”文中的“吾王”当是人们敬重的那几位顶尖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吧。未曾想到，这几句套用《儒林外史》之戏作，竟成了我们诀别之词。六十年往事，一幕一幕浮现眼前。从携手“漫游奇境”到相伴“拜礼吾王”，友谊的画卷就这样定格于此。他走了，而我呢？掸掸灰尘，收拾行囊，我将只身在学科上游的山岭中寻觅源头，独狼式地摸索前行。花开花谢，潮涨潮落，乃是自然规律，然而生命都渴望永生。“一切有死之物都希望通过生育繁衍这个唯一可能的方式达到永生，这种以繁衍的方式达到永生的欲望是动人的”（柏拉图）。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还有另一条达到永生的途径，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传播。人类可以遗留给后代的東西只有两种，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陆埏走了，但他传留于世的文化基因是厚重而珍贵的。通过这样的传承，陆埏将获得永生！